

唯物史观的文明话语

□ 董欣洁

在中文语境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文明一方面可指文化,另一方面可指社会发展至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文化则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也就是说,文明是指人类的社会实践成果。人的社会实践本身的丰富性,使得从多重视角区分文明成为可能。例如,从时间而言,文明可以区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从载体形式而言,可以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从宗教而言,可以区分为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从地域国别而言,可以区分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等;从生产方式而言,可以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甚至是呼之欲出的信息文明,等等。这些划分当然可能有所交叉,体现的正是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辩证统一。其中的显著特点则是文明的实践性与人类历史的实践性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明话语阐述上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各述文明之间能够发生交流与互鉴的现实前提。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中,作为社会实践成果,“文明的一切进步”(即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都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相应地,唯物史观的文明话语,是通过分析人的社会实践如何演化,探讨如何摆脱剥削压迫,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文明状态。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

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交往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突破阶级、地域等种种限制,指向“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实现人本身的自由发展。

与文明概念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国家和阶级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是为了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其本身划分为阶级(即人对人的剥削),也就是生产的积累和发展使得社会分配出现差别,不仅是文明产生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国家出现的基本前提。文明作为人类不同社会群体的实践产物,突出特点是在人的生产和交往的复杂互动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各种文明的发展都是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各种文明核心价值的凝聚和增值。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推展而言,人就是文明,文明既是人的创造物,也是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国家、文明构成了一体多面,分别从人的群体性、阶级性、实践性的不同角度描述了人类进入阶级时代以后的实际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发展中

心的变迁转移、文明实体的盛衰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交往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突破阶级、地域等种种限制,指向“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实现人本身的自由发展。

与人类文明同步发展的是社会生活状态的日益复杂。对于现代文明而言,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工业生产力和国际交换形成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导致的世界市场的存在,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劳动力也成为商品。但是,人之为人不,不应被异化、商品化。人类文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保有反思和自新的勇气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国际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将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瓦解”。这引发对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重新思考和新实践。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

社会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登上世界舞台,鼓舞了全球被剥削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人运用唯物史观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认识。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明确提出希望青年们“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李达认为:“近代物质文明本为现今社会罪恶之渊源,然其弊在资本主义之猖獗而不在工业之发展。生产力之发达为社会进化之原动力,苟能改造社会组织,未始不能使大多数人享受物质文明之幸福也。”何干之指出,大凡闭关自守的国民,不与世界文明相接,无可师法,一旦遇着新力的袭击,也唯有抱残守缺或日趋灭亡,因此输入思潮是在互相切磋、互相观摩,使“思想为作,日趋于新”,他主张“用批判的方法来接受外国文明”。华岗指出,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过程,都是劳动者的血与火的记录,历史是“人类生活斗争及其革命的实践所推进社会发展之一贯的全面的总述”。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话语从来不是孤立地就文明而论文明,而是从文明与社会、国家、历史的综合考察中分析如何通过革命实现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升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

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迫切时代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科学论断立足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大局,极大地拓宽了唯物史观文明话语的分析范畴。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是人类社会发规律的具体表现,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实践模式。这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由此可以看出,文明历程就是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展现,同时也说明,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容和意义就在于人类不同群体社会实践成果的相互启发、激励与借鉴,从而更好地实现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内涵之一,就是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这显然将会减小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文明实践的阻碍作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海洋及其赖以依存的港口,不仅从事着货物、信息、物种的交换,更是不同文明、族群、宗教的交汇之所。特别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逐渐连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和互动共生的网络。在此过程中,散布在港口地区的“贸易流散社群”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近代早期贸易流散社群的重要代表,16至18世纪,港口犹太人在新旧大陆之间从事着多层次、多形式、大范围的洲际交流互鉴。从很大程度上讲,港口犹太人及其参与的洲际交流互鉴是一部由海洋联结的微型全球史。

联结不同帝国和文明的港口犹太人

美洲的发现为犹太人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舞台,使之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分布在新旧大陆各大重要港口的犹太人通常被称为“港口犹太人”。港口犹太人活动的重要港口或岛屿有,欧洲地区(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阿尔托纳等);美洲地区(累西腓、库拉索、苏里南、圣尤斯特歇、新阿姆斯特丹、牙买加、巴巴多斯、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多明各等);西非地区(菲斯、圣多美、佛得角、塞内加尔等);亚洲南部和东部(霍尔木兹、孟买、果阿、马六甲、马尼拉、香港、上海等)。这些港口城市几乎都是当时最具活力的国际经济中心。

借助分布在各地的同胞,港口犹太人跨越宗教与民族的界限,在洲际之间开展交流活动,充当着不同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媒介”。与近代早期的其他贸易流散社群(亚美尼亚人、胡格诺教徒、海外华人等)相比,港口犹太人的洲际交流活动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特点:

首先,分布地域空前广阔,成为联结不同帝国和文明的纽带。以大西洋为中心,港口犹太人的活动范围涵盖了近代早期七大最主要的海上强国——威尼斯、奥斯曼、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这些殖民强国之间通常壁垒森严,但港口犹太人突破了种种限制,穿梭在各大殖民强国及其殖民地之间,并成功地将它们联结起来。

其次,以港口为依托主要从事海洋贸易,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引领者。港口犹太人具有鲜明的海洋特征,除从事传统的丝绸、黄金、珠宝贸易以外,主要从事殖民地贸易,包括奴隶、蔗糖、烟草、钻石、珊瑚、香料、兽皮、可可等。这些商品由港口犹太人从美洲等地运至里斯本、波尔图、马德拉、亚速尔等地,再进入欧洲各地的消费市场。港口犹太人所从事的海洋贸易,是大西洋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港口犹太人是新旧大陆之间贸易和物种交流的首倡者之一。犹太人是美洲的第一批商人,当地的许多制糖厂、种植园都由犹太人创办和经营。港口犹太人将蔗糖种植引入马德拉、亚速尔、佛得角群岛、圣多美与普林西普等大西洋岛屿,而后又将蔗糖种植引入南美洲,从而开启了作为大西洋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蔗糖业。烟草、香料、钻石等洲际贸易类型的引入,也得益于港口犹太人。

港口犹太人成功参与洲际交流的“秘密”

在没有国家载体为商业机构及其活动提供保障的情况下,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的港口犹太人积极开展洲际交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建立并维系跨地区的海洋贸易网络,达三个世纪之久。港口犹太人成功参与洲际交流并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得益于自身的诸多优势条件。

首先,流散社群与生俱来的“跨界”特质。长期的流散生活使犹太人具备较强的社交能力与环境适应力,善于判断当地的行情,灵活周旋于不同群体之间,充当着本地与外部进行商业交往的中介。

其次,港口犹太人具备突出的语言能力。殖民扩张初期,西方殖民者对美洲以及东方的了解十分有限,亟须探知外部世界的情况。犹太人具有出色的语言能力,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为广泛,得以从事翻译、顾问和航海向导等职业,正好满足殖民者的需求。

再次,港口犹太人建立的跨地区网络,是其成功参与洲际交流的关键机制。近代早期散居在大西洋两岸的犹太人虽然数量并不多,但他们通过家族网络以及各地的代理人、经纪人,在主要港口建立贸易据点。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写道:“他们(犹太人)建立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商业网络,因为他们遍布全球,在落后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充当手工业者、店主或者当铺老板。在主要城市

港口犹太人与近代早期的洲际交流互鉴

□ 艾仁贵

里,他们参与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的勃兴和商业的繁荣。”

近代早期犹太思想与欧洲思想的双向互动

从人口构成上看,活跃在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等各大海域的港口犹太人,多源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及其后裔。在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的过程中,大批塞法尔迪犹太人进行了空前的人口流动,大部分前往地中海、美洲、西北欧地区,另一部分进入北非、印度洋等地区。通过频繁的人口迁移,这些散布在各大海域的港口犹太人,不仅参与了洲际经济交流,而且推动了近代早期犹太思想与欧洲思想的双向互动,成为研究近代早期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案例。

一方面,港口犹太人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得益于近代早期欧洲的特殊环境。地理大发现后,许多欧洲国家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和国际联系,积极招徕从事海外贸易的犹太人前来定居,使犹太人的商业才能得以充分施展。在欧洲统治者看来,拥有雄厚资本实力以及广泛经济联系的犹太人是股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在与欧洲人交往的过程中,港口犹太人汲取了欧洲文明的丰富滋养,促进了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

另一方面,港口犹太人以其独特的国际视野和商业特征参与了近代欧洲思想的塑造,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在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和海洋扩张中,港口犹太人逐渐超越宗教的藩篱,转而追求现世的成功,由此产生了最早的怀疑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有17世纪中叶的世俗思想家乌里尔·达·科斯塔、胡安·德·普拉多和巴鲁赫·斯宾诺莎等,他们都是从葡萄牙随后定居在荷兰的港口犹太人。尤其被称为“第一个现代犹太人”的斯宾诺莎将怀疑主义精神推向顶点,强调历史的最高主宰是自然而非上帝,动摇了有神论的根基,推动了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的发展。此外,港口犹太人运用、改进和推广了一系列现代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包括代理人制、合伙制、海上保险、汇票等),不仅使自身的经济联系变得积极有效,而且促进了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和标准化,助推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欧洲的诞生。

总的来看,港口犹太人是文明交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同时又是文明互鉴的实践者和受益者。重新审视港口犹太人及其参与的洲际交流活动,不仅有助于突破传统大西洋史和犹太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发掘边缘少数群体在大西洋世界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理解犹太人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之间的深刻联系和广泛互动,从而为考察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一种不同的历史视角。

(作者系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概念史视阈下的“巴尔干”与“东南欧”

□ 李建军

“巴尔干”和“东南欧”都是指代欧洲东南部区域的名称,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被人们混用,即使研究这一区域的专业学者有时对此也不加分辨。然而,从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来看,其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能随意混用。本文从概念史视角对这两个名称的由来、内涵与差异作一初步考察,以便加深对该地区区域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理解。

从地理概念到文化区域

“巴尔干”一词源自土耳其语“山脉”。奥斯曼土耳其从14世纪起开始征服欧洲东南部半岛的一部分地区后,根据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尔·伊纳尔吉克的考察,奥斯曼人在半岛领地鲁米利亚最初是用“巴尔干”表示“山”的一般含义,后来该词被用来指从东到西分开保加利亚并与多瑙河平行的山脉。这条山脉自古希腊起在希腊语中被称为“哈伊默斯”,因此在19世纪之前,“巴尔干”和“哈伊默斯”两个名称同时并用。1808年,德国地理学家奥古斯特·措伊内以为这座山从保加利亚经黑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几乎横贯半岛,正如亚平宁山脉对亚平宁半岛的得名意义,认为该山脉对所有巴尔干有着相似的重要意义,建议将巴尔干山作为其在半岛的名称,“巴尔干半岛”由此得名。此后,他的推断被法国地质学家阿尔·布埃和奥古斯特·格里瑟巴赫等人进一步阐发。

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学者约翰·格奥尔格·冯·哈恩等人发现了以往地理学者的错误判断,指出“巴尔干”所指的山脉实际上只是由保加利亚的老山延展了420千米,没有与东南部欧洲其余山脉形成连贯的地表体系,于是提出了对“巴尔干半岛”命名的批评。哈恩在1861年出版的《从贝内格莱德到萨洛尼卡的旅行》中,对于“东南端的整个三角形欧洲”,提出了“东南半岛”的概念。1893年,德国地理学家西奥博尔

德·费舍尔在哈恩提议的基础上,建议用“东南欧半岛”来代替“巴尔干半岛”,并将其北界移至萨瓦河—多瑙河一线。

地理名称上的纠错并没有使“东南欧”立刻取代“巴尔干”成为该地区的名称,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对“巴尔干”感兴趣的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者,在这一名称地理起源的基础上,赋予了其历史文化区域的意义。奥古斯特·莱斯金、古斯塔夫·韦根等比较语言学家致力于发现该地区语言和民间传说中的公共元素,并用“巴尔干主义”来表示“巴尔干”并不相关或仅是近亲的语言所共有的特征”(当然该词的含义在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学家也在寻找巴尔干的历史共性。巴尔干学的奠基人保加利亚人类学家伊万·D.希什马诺夫认为,“巴尔干半岛”是一个长期共存、互动和渗透的波动空间,每种特征都是在与其他文化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演变而来,使得这一历史区域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另一位巴尔干学奠基人约万·茨维伊奇也把该地区描绘成一个互动的单元,认为其主要受三种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分别是历史事件、文明地带和各民族及族群的迁移。不过他得出了与希什马诺夫不同的结论,突出强调该区域的多样性、复杂性,且认为“文明影响缺乏连续性是巴尔干半岛的特点”。总之,巴尔干成为一个语言、宗教、文化交流互动紧密且高度多样化的区域。

到19世纪末,“巴尔干”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政治含义,用来指从奥斯曼帝国脱离出来的国家,如希腊、塞尔维亚等。自20世纪初,“原始性”和“暴力倾向”越来越被添加到“巴尔干”的形象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遭污名化。尤其是随着民族主义的泛滥,“巴尔干”开始成为侵略、不宽容、半发达、半文明的象征。“巴尔干化”一词也在其背景下派生出来,用于指称地理和

政治单位不断裂变的现象。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带有贬义的“巴尔干”作为地理区域名称再次受到批评,使用“东南欧”一词的呼吁变得更加强烈。1929年,德国地理学家奥托·毛尔强化了将“东南欧”作为半岛恰当名称的观点。用德国历史学家马蒂阿斯·贝尔纳特的话说,“东南欧”将成为一个“中立、非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概念。不过,随着纳粹德国对“东南欧”的使用政治化,“东南欧”被纳入第三帝国巨大的经济空间,其中立性很快被否定,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一词在非德语学家的学术文献和通俗出版物中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事实上,“东南欧”作为地区名称从学术争论中浮现出来,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共性。倡导使用“东南欧”作为分析单位的代表学者是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尼古拉·伊奥尔加。他详细阐述了“东南欧”的历史连续性和凝聚力,以此来批评“巴尔干”命名的不合理性。他不认同茨维伊奇关于“巴尔干”文明综合的观点,认为该地区的特点是“综合了整个东南欧共有的一种完全独特的特征”。这种综合的主要元素来自古代色雷斯人和罗马人。后来,罗马的秩序被新罗马—拜占庭帝国所延续,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又继承了这种传统,他们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延续者,推行的是同样的集权主义和地方自由的混合物”。因此,“东南欧”是多种历史的共通,是多种声音的对话。基于此,二战后“东南欧”的概念并没有消失。

两种历史趋向的折射

笔者认为,“巴尔干”和“东南欧”的并行混用,折射的是整体主义和特殊主义在这一地区的独特演变。一方面,“东南欧”折射的是整体主义历史趋向。自古以来,这一地区聚合的主要势力包括马其顿王朝、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作

为统一的力量支撑着“东南欧”的概念。在巴尔干学家彼得·斯考克和米兰·布迪米尔看来,奥斯曼帝国起的并非消极的作用,土耳其人在将社会和文化凝聚力强加于整个地区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除了奥斯曼帝国对拜占庭制度的维持,它还通过强加同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有效地融合了该地区人民的心态。但是与“一致统一”的“罗马和平”不同,拜占庭和奥斯曼时代的巴尔干地区倾向于“变化中的统一,多样的统一”,且“多样的共性”比“一致的统一”更有效、更持久。因此,这个“大熔炉”不是融合的异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积极回归欧洲便是这种地区历史演化趋势的再延续。

另一方面,“巴尔干”反映的是特殊主义历史趋向。奥斯曼对巴尔干地区的征服意味着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入侵,加剧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排斥和成见,也加强了该地区在其他基督教欧洲国家的形象。19世纪,这种成见固化为东方主义的烙印,巴尔干成为欧洲的他者。《巴尔干五百年》的作者马克·马佐尔就曾这样断言:“巴尔干的城市都被形容成有欧洲的门面,门后却是东方的现实景象。”波兰历史学家奥斯卡·

哈雷茨基和匈牙利学者斯苏兹·耶诺等都认同巴尔干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脱离了欧洲历史。巴尔干学家托多洛娃则得出结论,奥斯曼帝国的因素促成了目前人们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即暴力、半发达等消极特征。从以上上讲,巴尔干实际上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此外,该地区的民族主义也是特殊主义趋向的组成部分。

总之,“巴尔干”是分裂的欧洲的一个缩影和象征,折射的是奥斯曼帝国与之前历史的断裂,强调的是历史变异,以及种族混合和离散因素造成的巨大异质特征;而“东南欧”则反映了该地区历史演化的有机统一观念,追求的是文化共性,强调的是跨越时空的亲缘关系和渗透性。这两个不同概念的使用,取决于强调该地区的统一共性还是异质特性。在当下该地区迈向欧洲一体化的阶段,“东南欧”作为超制度的历史文化反映似乎更受欢迎。但是,只要这一地区最终不出现制度化的同质实体,“巴尔干”这一名称在短期内就不会消失。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世界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

扫描二维码 查看世界史更多内容